

論王道及其《老子億》

——明代的《老子》研究之二

李 慶

和文要旨

王道は明の嘉靖時期の学者である。しかし「明史」の中に彼の伝記はなく、彼の生涯についてはまだ不明の点が多い。

彼の「老子億」は明代の「老子」研究の代表的な作品であるにもかかわらず、今世紀30年代にいたるまで、長いあいだほとんど注意されなかった。

明の嘉靖時期に刊刻された「老子億」という本は、今世紀30年代に日本で発見、影印されたが、そのについての研究論文は、筆者の寡見によると、まだ少ないと言わざるを得ない。

本論は王道の生涯についていくつかの問題を考証し、その上で「老子億」という本の流伝、その内容、特色を検討する。さらに「老子億」を焦点として明代嘉靖時期の中央政府内部の党派闘争、及び当時の社会思潮変化の一側面を究明しようとするものである。

本論は筆者の一連の「明代の老子研究」の第二篇である。

王道的《老子億》，是明代有代表性的《老子》研究著作。当时很受学者重视。嘉靖、万历间数次刊行，林兆恩《道德经释略》中引用，何良俊《四有斋丛说》也曾提及。《千顷堂书目》《明史艺文志》俱著录。但在此以后，渐烟没无闻。直到本世纪30年代，在日本的前田氏“尊经阁”中，被“发掘”出来，影印行世。这才又一度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中国的天津图书馆，日本的秋田市图书馆也发现了所藏本。（见1932年日本影印尊经阁所藏本《解说》）

据《全国善本书目》子部道家类著录，全国仅社会科学院图书馆藏有一部嘉靖本。但是对它的研究，笔者孤陋寡闻，尚未见到。

笔者在拙作《明代的老子研究》一文中（见金泽大学外国语教育研究中心

《言语文化论丛》第一号，1997年），曾对此稍加涉及，限于论述的角度，未充分展开。在此，拟以此书为中心，再进一步作些探讨。想谈这样四个问题：

一，王道的生平。

二，《老子亿》产生的时代和流布。

三，《老子亿》的内容和特色。

四，王道和《老子亿》所反映的嘉靖前期党争和社会思潮。

一，王道的生平

王道，字纯甫，号顺渠，山东武城人。关于他的生平，《明史》无传。据考，现存最早的记载他生平的文字，是严嵩作的《神道碑》，现《钤山堂集》卷37收录。明焦竑《国朝献征录》卷26，也载有此文。明雷礼的《国朝列卿记》卷29《吏部左右侍郎年表》、凌迪知《古今万姓统谱》卷49、郑晓《吾学编》卷39，何乔远的《名山藏》卷20、清徐开任《明名臣言行录》、道光年撰《山东通志》卷28等，都有关于他的记事。

根据这些记载，可知：他生于成化丁未（1487），卒于嘉靖丁未（1547）。正德辛未（1511）进士，曾先后主掌南、北国子监。屡引疾辞官，非肆力追逐名利者。最后官至吏部侍郎，死于任上。又据《明儒学案》卷42所载其传曰：“先生初学于阳明，阳明以心学语之，故先生从事心体，远有端绪。前后，因众说之淆乱，遂疑而不信。”则知他曾受阳明学之影响。

但这些记载中，颇有一些异同，他生平的一些关节点，年代时间尚不明确。现根据所见资料，略事考证如下。

（1）王道何时为应天府教授？

严嵩作的《神道碑》：“正德辛未之岁，举进士，选入中秘。时山东寇乱，欲奉祖母避地江南，上疏乞补学职，词极恳切，得应天学教授。”具体时期，诸家传记中，俱未明言。

考《王顺渠文录》卷十一有《壬申改官南行次韵留别馆中诸同年》，则去为应天教授，当在正德壬申，即正德七年（1512年）。

（2）何时为吏部文选郎中？

严嵩作的《神道碑》曰：“往予承乏吏部，以侍郎掌部事。时公为验封郎中，特越常序，奏改公为文选。予以此忤用事者。”

考嘉靖初吏部情况（所据资料为：《明史》的《宰辅年表》《七卿年表》，《明通鉴》，《国榷》，因综合论述，不一一注明）：

嘉靖六年十月吏部尚书李承勋为刑部尚书（是时，方献夫为吏部侍郎）。十一月，桂萼为吏部尚书（《明史》《七卿年表》，《明通鉴》2007页），方献夫代桂为礼部尚书。

嘉靖九年吏部尚书方献夫辞职。这是由于夏言攻击方献夫之故。（见《明史方献夫传》，《明通鉴》2062页）但吏部并未立刻派新尚书，“犹虚吏部尚书位以待”（《明通鉴》2065页）。其间，只有王琼在嘉靖十年间，当了几个月的尚书，死去。（见《明史本传》）

嘉靖十年五月，方献夫被召还，主持吏部，并入阁。直到十三年致仕。（见《明史》本传，《宰辅年表》，《明通鉴》卷55，2075页）故其间无严嵩主持部事的可能。

所以，“往予承乏吏部，以侍郎掌部事。时公为验封郎中，特越常序，奏改公为文选。予以此忤用事者。”这一情况，只可能是在嘉靖九到十年间。其所言“用事者”，似指正在渐渐得势的夏言。从王道为官的顺序来看，也正合适。

（3）何时为南京国子监祭酒？何时辞去？

何时为南京国子监祭酒？严嵩作的《神道碑》未明言。《明儒学案》卷42曰，在“嘉靖十二年”。此说可再考。

据《神道碑》，是由“大学士西樵方公”推荐。

考方献夫为大学士在十一年五月（《明史》本传、《宰辅年表》，《明通鉴》《国榷》“嘉靖十一年”条下）。因而他推荐王道为“春坊左谕德”，当在此后。1932年日本影印嘉靖本王道《王顺渠文录》卷九有《辞祭酒第一疏》，称“十一年九月内误蒙辅臣方奏荐由郎中升左春坊左谕德”，王道不就，以病辞。“居一载，起为南京国子监祭酒”，按此说推算，当在十二年九

月以后。

和王道同为进士的林文俊著《方斋存稿》卷2有林氏《谢重幸学表》，为“南京国子祭酒”时所上，时在嘉靖十二年三月后（中有“十二年三月十三日，钦蒙圣驾临幸大学”句）。又有《谢恩疏》，记林文俊在“嘉靖十三年二月二十八日”由国子祭酒为南京吏部右侍郎。故嘉靖十二年三月到嘉靖十三年二月南京国子祭酒似并无空缺。

所以，王道为南京国子祭酒当在此以后。也就是在嘉靖十三年三月以后。

未几他又辞祭酒。最初上疏，是在四月。后上疏获准。于嘉靖十三年九月去职。（见《王顺渠文录》卷九，《谢恩疏》）。

《神道碑》《明儒学案》俱云，家居十三年，“嘉靖丙午”才又被起用。依此推算，他的辞职，在嘉靖十三年，也正相合。他的辞职，我以为和方献夫的去职有关，待下面再论。

（4）王道何时去世？

清徐开任《明名臣言行录》称其“嘉靖三十四年，起为南太常卿…甫阅月，卒。”

考严嵩作的《神道碑》、《明儒学案》卷42，谈迁《国榷》俱明载为嘉靖丁未卒。且明记为“七月二十一日”（《神道碑》），徐氏误。

根据上述考证，王道的生平简表，可列之如下（所注西历年代，仅作参考。）：

生于成化丁未（1487），父名王宗，母李氏。

5岁丧母，由祖母抚养大。（《先考王府君先妣李宜人合葬墓记》，见《王顺渠文录》卷八）

正德辛未（1511）进士，时24岁。先为翰林官，后出为应天府教授。

正德壬申（1512年），为应天府教授。

正德甲戌（1514年），为南京礼部主事。（严嵩《神道碑》）

在正德末嘉靖初，改任吏部。回到北京。为吏部验封，和马理、高叔嗣同署。（《明史文苑传》“高叔嗣传”）

在吏部干了十年。

嘉靖庚寅（1530年）前后，在严嵩主持吏部事时，为文选郎中。

嘉靖壬辰（1532年），方献夫推荐王道为“春坊左谕德”，不就，以病辞。家居一载。

嘉靖甲午（1534年）三月，“起为南京国子监祭酒”。同年九月，他再次辞职。殆因方献夫在是年致仕之故。（见《明通鉴》）因不满宦场争纷角逐，退官闲居十三年

嘉靖丙午（1546年）六月才又被起用。为南京太常卿。未至。

十月迁南京户部右侍郎。又改为礼部右侍郎。

嘉靖丁未（1547年）三月，召掌北京国子监。履任三个月。

五月改吏部右侍郎。阅月，大病。卒于嘉靖丁未（1547）“七月二十一日”（《神道碑》《国榷》）。

再考其交游。根据《明史》《明儒学案》王道的《王顺渠文录》等的记载，他的交游有：

王守仁、朱守忠（一作“中”，见《明儒学案》卷42）、欧阳南野、刘士凤、吕泾野、高伯玉、刘原博、林次涯、张历由、徐东庄、尤麟、（以上见《王顺渠文录》）

马理、高叔嗣、魏校（以上见《明史文苑传》）等。

《明史徐阶传》载，他提拔者有：王道、欧阳德、宋景、张岳等，俱在吏部，则王道与这些人也当有所交往。

这对于进一步探讨王道的生平和思想或可作参考，现暂录存于此。

二、《老子亿》产生的时期和流布

由上述可知，王道的一生，在明代中期的动荡中度过。所著《老子亿》，正是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产生的。那么，具体来说，《老子亿》成于何时呢？

《老子亿》刊于嘉靖间，从全书来看，首尾完全，成书当在王道死前。即嘉靖二十六年前。

王道自云：“余自中岁，颇好读《老子》书，遇会心处，辄詮数语于其简端，积久成帙。”（《老子亿》卷上）则可知，“中岁”后，又“积久”方

成。以“中岁”为四十岁左右计，参以王道生平，则当在嘉靖六、七年间。即在此以后，王道“颇好读《老子》书”。

案，《老子亿》37章的解说中，引“亳州薛氏”语，可证较薛氏后出。亳州薛氏指薛蕙。

薛蕙《老子解》刊于嘉靖（见《全国善本书目》子部道家类）。

薛蕙在书《自序》中曰：“予早岁嗜神仙长生之术，凡神仙家之说，无不观也。晚读《老子》而好之。”

考薛蕙正德九年进士，卒于嘉靖二十年。年五十三。（见《明史本传》又见唐顺之所撰《墓志铭》，载《献征录》卷26）自称“晚读”，当在壮年以后。而著作则当更晚。所以，从推算来看，薛蕙的《老子解》当成于在嘉靖十年（1531年）以后。

故王道之作的完成，最早不会早于嘉靖十年。参以上述王道生平，嘉靖十二、三年，正值他人生变动之秋。似也未必能安心著作。

再从其思想倾向来看，据《明儒学案》卷42所载其传曰：“先生初学于阳明，阳明以心学语之，故先生从事心体，远有端绪。前后，因众说之淆乱，遂疑而不信。”

王守仁对《老子》，在早期是有一点不满的（见上海古籍出版社标点本《王阳明全集》所载《山东乡试录》，第五道之二“问佛老为天下害”。此录载隆庆本《王阳明全书》本卷三十一，或云，此非阳明所作。但反映了阳明的思想当无误。）王道早期从王学，对《老子》不会那么热衷。反之，他“中年”后对《老子》的关注，也反映了他对王学的一些反拨。又，《老子亿》中，表现出对王阳明“心学”后期的“致良知”说的某些不同意见，（具体说明见下一部分）因而，从思想倾向上看，也当是王道较后期的作品。

笔者从王道的现实生活和思想的发展情况推论，《老子亿》成书，当在王道嘉靖十三年辞去南京国子监祭酒以后，到嘉靖二十五年前后再次被荐，出任官职之间，也就是所谓“十三载”在家赋闲期间。具体来说，是1534—1546年间。这是他经历了人生的沧桑，饱览了宦海波澜之后，思考的产物。

《老子亿》初刊于嘉靖。《全国善本书目》子部道家类著录为“嘉靖四十

五年”本。刊刻者是无锡的安如山，自称为王道的“后学”（见《老子亿》卷末）。无锡安氏，为当时藏书大家。见《藏书记事诗补正》卷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安如山为嘉靖八年间进士，曾为地方官员。事见《南阳府志》卷六（明万历四年刊本）。

而万历三十七年，又有聊城朱延禧刻本（和《大学亿》《易亿》《文录》合刊，见日本影印本的《解说》），未见。

此书在明清间传入日本。被加贺藩前田家第十一世前田纪纲所收藏。（见影印本《解说》）

后来，和前田家的图书等一起被收入尊经阁文库。书中有“前田氏尊经阁图书部”篆体朱文方印。

民国间，丁福保撰《老子道德经笺注》，所列书目中有曰“《老子亿》二卷，明王道撰，亡。”日本学者或以此为契机，在调查中，发现此书，因而在1932年影印出版。

从此书的流存情况来看，也反映了明中叶以来中国和日本之间文化交流的一个侧面。

三、《老子亿》的内容和特色

首先，想讨论一下，何谓《老子亿》的“亿”。此语出《论语·先进篇》。孔子曰：“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对此的解释，朱熹《集注》和何晏、邢昺《注疏》等著作，有所不同。王道在《老子亿》卷上的开头，曰：“孔子谓，赐也，亿则屡中。”删除了《论语》原文中的“不受命，而货殖焉”，用意显然，也就是说，他并非“货殖焉”。

《老子亿》接下去说：“是使赐多言也。”这一句话，为朱熹《集注》中所列“范子”（庆按：宋代范祖禹）引的孔子之说。王道似要说明，自己正就是在“多言”这样的意义上来使用“亿”字的。

因而，笔者理解他取此名的意思是：《老子》说“多言数穷，不如守中。”“知者不言，言者不知。”王道认为，自己虽不受命，又多言，但还是把自己的一些体会说出，或许能“中”“圣言”之旨。

顺便说一下，《全国善本书目》子部道家类著录作“老子臆”，“臆”虽和“亿”有相近之意，但字误。

其次，看看《老子亿》的具体内容。笔者认为，包括如下部分：

(1)，对版本文字的考定。

如：13章：“宠辱若惊，贵大患若身。何为宠辱？宠为下，得之若惊，失之若惊。”

王道校曰：“‘宠为下’，一本作‘辱为下’，解者随文生意，恐皆未当。当作‘宠为上，辱为下’，庶几意足。”

考明代通行的《老子》为王弼注本，作“宠为下”，影宋本作“辱为下”。他的论断正确与否，此姑不论，可见的是，他曾参校了其他本子，再加论列的。

31章：“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也。”

王道校曰：“佳当作甲，如《论语》加假之类。盖声相近而误读也。甲，鉴也，兜、鍪？之属亦在其中。兵口（庆按：此字不清。）兵也。甲兵皆用以争而杀人之器也。”

也就是认为，此处的“佳”乃与“甲”因音同而误。和“兵”为同一意。

此处“佳”字历来争论甚多。如傅奕本作“美兵”，以“佳”作“美”解。河上公本解作“祥，善也。”元吴澄《道德真经注》曰“佳，犹云嘉之也。”明代也多有作类似解者。清王念孙《读书杂志余篇》，认为当作发语词“唯”解。日本近年福永光司、金谷治先生都同王念孙之解释。（见他们各自注译的《老子》。福永光司为朝日新闻社《中国古典选》本，金谷治为讲谈社学术文库本）要之，近年来的趋势，是认为此字并非“兵”字的修饰语。考帛书甲、乙本都没有此字。王道之论，虽说未必最妥当，但他注意到明代流行的解说，尚未安妥，并进行了推论，所得的结论，和后来的出土古本较为接近，这也当予肯定。

(2) 对每一章义理的说明，阐述。

在《老子亿》中，王道对各章的文字内容，作了解说。尤其是一些有关《老子》的重要概念的解释，对我们的研究，颇有参考价值。

如：14章：“视之不见名曰夷，听之不闻名曰希，抟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诘，故混而为一。”

“一”，这是《老子》一书的关键性问题。王道解曰：“道本无形与声。无形则视之不见，抟之不得，可名曰夷与微夷。无声则听之不闻名曰希矣。然皆强名，非常名也。从而诘问之，则至道本无差别，而三者悉归幻妄，故不若混而合之，名之为一，犹不失其为浑然之体也。篇内所谓‘抱一’‘得一’，凡言一者以此。”

这是对《老子》中“道”“一”等基本概念的定义和说明，也是对这一节义理的阐述。

关于老子思想中占重要地位的“道”“德”和“仁”“义”等概念的关系，王道对38章“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的说法，进行了阐述。

他认为：“所谓仁也、让也、俭与戚也，非老子之所谓忠信乎？不仁、不让、不从先进而徒事夫歌也舞也玉帛钟鼓也，非老子之所谓忠信之薄者乎？二圣授受之妙，其或在此。”

“老子之言，执古御今之极致，孔门之学，抚世酬物之常态。虽若不同而实互相发也。”认为二者之间有着一致性，只是侧重的方面不同而已。

关于道家主张的“道”，和儒家强调的“仁”“义”等的关系，是《老子》研究中的一大问题。王道的解释，某种意义上说，应该是较合乎《老子》的原意的。（1998年10月12日，裘锡圭先生在东京大学作关于《近年出土的简策帛书在文献学上的意义》的报告，引用《郭店出土竹简》中《老子》第十八章的文字，作“古大道癸（废），安有仁义。六新（亲）不和，安有孝孳（慈）。邦家緡（昏）口，安又（有）正臣。”将此和马王堆本、王弼本、傅奕本对照，指出，老子并不否定“仁义”，而是把它视为比“道”低一层次的概念。可见王道的认识，和早期流传的《老子》本子中的思想较为相近。）

（3）对各章之间关系的探索。

《老子》一书的分章，各章之间的关系，以及排列顺序，历来有争论，如，有的作81章，有的作64章等等。出土文物中所见的《老子》，在各章

的分合上也多有不同。

王道认为各章间有着关联，并在解说中，力求阐明各章间的关系，如他在解说中说：

第1章：“此章乃五千言之肯綮，千圣之要诀。”

第2章：“此承首章而言，举非常之事以显真常之道也。”“此章言圣人以道而治身也。”

第4章“此承首章言道之体。”

第39章“此承上章之意而言一即上德也。”

第49章“此承上章无事取天下之意而言常心，犹言成心执著之谓也。”

第58章“承上章言闷闷无为无欲之意。”

第62章“道者万物之奥善人之宝不善人之所保”后，曰：“此即前章‘万物尊道贵德之意也。’”

第71章：“承上章而言。”

第74章：“此申上章‘圣人犹难之’之义也。”等等。

由此可见，他认为《老子》各章之间，并非孤立的存在，而是以若干章组成了一个单元，论说某一个中心问题。这种探讨各章之间关系的思考，在明代《老子》研究中，并不少见。如朱得之的《老子通义》中，也可见。王道的见解，在我们进一步探讨《老子》的构造和有关问题时，可作参考。

以上，是《老子亿》构成的主要情况。下面，在来看看《老子亿》解说内容，有些什么特点。笔者认为，有如下五个方面：

第一，以儒解老，融和三教之说。

明代初，朱元璋确定了“三教”并用的政策。整个明代，呈现出“三教合一”的倾向。但是，具体来说，如何“合一”呢？在不同时代和不同人物身上，表现出来的情况是不同的。《老子亿》表现出的倾向，就是以儒家的学说，特别是宋代理学的一些理论来解释《老子》。

如，他的解说中，引用宋代周敦颐有关“无极太极”的思想，来说明“道”。

第1章：“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

他解释曰：“无名者，道也。庄子所谓‘常无有’，周子所谓‘无极’是也。自本自根，生天生地，故曰天地之始。有名者，道所生之一也，德也。庄子所谓‘太一’，周子所谓‘太极’是也”这当是沿袭宋代以来融汇《易》《老》的思潮的反映。

第29章：“将欲取天下而为之，吾见其不得已。”条的解说中，王道认为：“天下乃至神之器，其感应有自然之机，其变化有无方之妙，非人之智力所能为，亦非人之智力所能执也。”解引程子语曰：“程子曰，凡动皆为感，有感必有应，所应复为感，所感复有应。感应之变如循环。然放或（庆按，疑此字衍。）之或之者，非一定也。”认为“此无方之妙也。”

类似之处，在《老子亿》中所在多有。

不仅只是解释，他还注重将儒、道、佛的思想加以沟通，强调二者或三者的共同性。

24章，“跂者不立”条下，引程明道语曰：“程明道曰，人能见道，则尧舜事业只如一点浮云过目，视世之功名甚是闲，视世之为仁义者，甚煦煦子子？其言与老子合。”

71章：“知不知上，不知知病。夫惟病病，是以不病。圣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

考此章，《道藏》本、景龙碑本，帛书甲、乙本都无“夫惟病病是以不病”。当是后人将注文混入。

对这一章的解释，历来多以为是老子对孔子在《论语》中所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为政》篇）的批判，表现了两种学派在对待知识的态度和认识论上的区别。有的甚至由此而主张“小人不知道意，而妄行强知之事以自显著，内伤精神，减寿消年也。”（见《河上公注》）

但是王道则认为：“言此接引世人以渐入道之几，亦犹孔子之告子路也。孔子谓知之为知之，而老子乃以知不知为上，何邪？盖心之知有涯，而道体无涯，道固非知之所能尽也。故曰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知焉。彼知而自以为不知，非真知道之不可以知尽者不能及也。故老子上之。若夫孔子之言，则

为子路发耳。”

也就是认为，二者只是层次上的区别，而并非对立。

象这样的以儒家经典解说《老子》中有关的重要概念，用自己的解说，沟通二者之间的矛盾对立，在王道的《老子亿》中是非常明显的。

此外，在14章“故贵以身为天下，则可寄于天下，爱以身为天下，乃可以托于天下。”的解说中曰：“程明道有言：人能将此身放在万物中一例看大小，大快活。正与老子意同。推究其极，则孔子之绝四，释氏之无四相，皆不异此。在人善体会耳。”

“孔子之绝四”，殆指《论语·子罕》中说的：“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释氏之四相”，说法有多种，通常是指：“生、住、异、灭”四相（参见《俱舍论》），而《金刚经》作“我、人、众生、寿者”四相。

这样，王道的解说，就不仅是儒道二家，而是“三教合一”了。

然而，他的“三教合一”，并非把儒家的学说混同道家和释家，而是力图用儒家的学说来解释《老子》，以求沟通三家的一些基本观念。就其基本倾向来看，还是以儒家为主。

第二，批判前人诸说（如对王安石、朱子等宋代人解说），表现出相当的独立精神。

虽说王道是以儒解老，然而，他并非处处只作调和，而是相反，持有一定的立场。最明显的是，他不时对于朱子有所批评，对孟子、韩非等等，也都不那么恭敬。

比如，在第10章的解中，曰：“章首‘载营魄’一语，乃此书中一大公案。古今注释甚多，率皆支离牵强。朱子辨之是矣。但其所自为说，亦非后学所能尽晓。今略疏其可疑者于此，俟与知者共讲之。”

朱子对这《老子》一章的解说，可参见《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五。

王道在上述文字后，列出四条可疑之处：

“以车载人之载，与以人登车之载，义本无别而强分为二，虽援证据，终欠明白。其可疑者一也。”

“旧注以‘营’为‘魂’，辨其非字义矣。及其自释，乃与‘荧’同，而为晶明光炯之意。且‘魂’‘火’二也，‘魄’‘水’一也。不知荧荧然而晶明光炯者，火耶，水耶，魂耶，魄耶，未免自相矛盾，其可疑者二也。”

“‘魂常附魄，如日光之载月质。魄常检魂，如月质之受日光。’其取喻非不精也。但《老子》之意果如此，则当曰‘魂载魄’，而不当曰‘载营魄’且既不以营为魂矣，后人何从而知其为‘魂载魄’耶？其可疑者三也。”

“《老子》‘载营魄’之要，在于抱一。其抱一，则在于无为自然而已。非欲于‘营魄’上加之意也。所以为圣人易简之道。若如朱子之说，以魂加魄，以魄检魂，则一身之内，魂魄交争，无时休息，火炎水沸，气散精流，盍然尽矣。尚望其能长生久视也耶？其可疑者四也。”

这是对朱子之说的批判。

第11章批判王安石，引杨龟山语，认为“深中其病”“荆公盖未尝闯犹龙（庆按，指老子）翁之藩也，况堂奥乎。”第65章“故以智治国国之贼”条下，批判宋代“神宗而下，始以智治国矣。”对王安石变法等的做法，颇有非议。（参见38章解，文长，不引。）

第19章批评“宋儒”视老子为异端，是“异于孔孟”的过当之论。凡此，俱是其例。

这种情况，恐怕和当时社会上对以朱子为代表的宋代学问的崇敬心理有所波动，也就是和阳明学的兴起，有一定的关联吧。

在王道看来，宋代，甚至更早的解《老》之作，都未必可信，只有自己的解说才是正确的。充分表现出一种学术上的自信。

第三，不把《老子》只看成是“形而上”的抽象教义，而且作为现实生活和处世的指南。

王道探索《老子》“道”“德”“一”等“形而上”概念的意义，也同时阐述《老子》有关“形而下”，也就是在现实生活中实际运用的内容。

他根据《老子》的教义，在现实生活中，主张“执中”不争，静观无为。如第8章：“上言不争者，水也。此不争者，若水之人也。人惟好恶太明，刻核太过，不能随顺方便以处斯世，故不免人我对立而有争端。”很显然，这就

并非只是解老，而且有教导指斥世人的意味了。

不仅如此，更重要的是，他还强调，在《老子》中，有所谓“内圣外王”的内容。也就是说，《老子》乃经世致用之书。

16章“致虚极，守静笃”下，曰：“此章言内圣外王之道。其要在于虚静而已。司马子微曰，不受外名曰虚心。心不逐外名曰安心。心安而虚，道自来居。安即静也。”

38章，解曰：“《老子》此章大义，乃历推皇帝王霸经世之常，以极古今淳离之变。而圣人挽今复古，执古御今之妙，实寓乎其间。”

57章“故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解曰：“引圣人之言以证无事取天下之意。”对此说甚为赞同。

73章“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条下曰：“我朝太祖高皇帝因感老子此言，遂罢极刑，正得圣人犹难之之意。宗社万年之庆，实基于此，为臣子者，所当服膺而无失也。”

都明显地可以看出这样的思想。

《老子》一书中有治世权术、兵法等，也就是有形而下的具体致“用”的内容，他在书中的有关章节，对此加以阐述，以求和儒家的“内圣外王”说统一。

这种情况，和当时社会的现实有关。明初，朱元璋，就认为《老子》可供治世之用。（参见拙作《明代的〈老子〉研究》，载金泽大学外语教育研究中心《言语文化论丛》第一号）这是明代对《老子》认识的一大特点。在王道的著述中，也反映了出来。

第四，和把老子神格化的道教神仙说，划清界限。

第6章，对李道纯所主的“一呼一吸，化生金液”的道教养生说，表示不满：认为《老子》的原意，是“欲人自强”，“旧注直以为口鼻，恐失之浅。”

和“神仙家”之流的区别甚为明显。

第五，文笔贯通，略见文采。

笔者在拙作《明代〈老子〉研究》一文中谈到，王道的《老子亿》，是明代以儒学解《老》的代表性著作。比起薛蕙的平实来，它显得神情肆扬，文笔贯通。

如对第六章“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的解说，认为“不知者不睹其真，而徒与我哢哢也。”在二十三章解的最后，叹曰：“悠悠千古，向谁晤语”，都可见其剀劘独特之气。

他的文字也颇流畅，每一篇解说，上下通贯，非仅鉅釘章句，读来令人有起伏波动之感。这在明代的解老著作中也是不多见的。

四，《老子亿》所反映的嘉靖前期党争和社会思潮

在上面几部分中，我们探讨了王道这一位明代嘉靖时期著名学者的生平、他所著《老子亿》的流传、内容和特点。在这最后一部分中，想以《老子亿》为焦点，简单地看看由此反映出的王道的思想变化、嘉靖前期党争和社会思潮沿革的情况。

1，王道思想的变化。

王道先曾受阳明学。前引《明儒学案》卷42中已论及。又，《王顺渠文录》卷十一有《哭友人朱守忠侍御四首》，有自注：“守忠与余同游与王阳明先生之门”，都可证明这一点。

他得到方献夫、徐阶提拔（见上引严嵩《神道碑》、《明史徐阶传》），恐怕和同受阳明学，也不能说毫无关系吧。

他曾从不少方面对朱子进行批判。除了前面讲过的《老子亿》中的内容以外，在《王顺渠文录》卷一《诗经关目佳》中曰：“朱子为传，翻倒注疏，自立门户，则异甚矣。”在同书卷四《近思录》条下曰：“朱子分析支离，是己非人，其於道浅深如何哉？”表现出对朱子学的疑问。应该说，这反映了他对朱子学的态度。

然而在谈到王阳明的学问时，情况就有所不同了。他针对有人“谓阳明论心即理、理即性非是。”之论，说：“物理不外吾心”“阳明此见甚是。”

“此学问大头脑处，不可轻易放过。”（《文录》卷六“谓阳明论心即理、理

即性非是。”条下)

在《老子亿》中，他对“心”的基本看法，和阳明“无善无恶”之说也基本相通。如47章解“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片雍见天道”曰：“此言圣人尽性至命之学也。尽性则物我为一理，故不出户而可以知天下，所谓‘万物皆备于我，反身而诚莫大焉’者也。至命则天人一理，故不窥片雍而可以见天道，所谓‘与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时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者也。”

49章解“善者吾善之”一节曰：“盖心之本体，原无善恶，所谓一而未形者，德之谓也。”

这和阳明主张的“无善无恶心之体”（四句教）的看法相似。

但是，王道对王阳明“良知”说又有不同看法。

《明儒学案》卷42，有《次阳明诗咏良知》诗：“若把良知当仲尼，太清却被片云迷。良知止是情之动，未动前头尚属疑。”“独知还是有知时，莫认独知即正知。寻到无知无物处，本来面目却为谁？”“本来面目却为谁，绝四宜尼定自知。学子欲寻绝四处，不先格物更何为？”

又录有《答朱守中书》：“阳明先生致知之说，大略与孟子察识扩充四端之意相似而实不同。……阳明先生所见，固存省之一法，然便欲执此以尽。……是几於执一而废百矣。”

这是对阳明“致良知”之说的批判。也就是说，王道重视人的主体性——“心”的重要作用，但并不同意“心”或“良知”就是作为宇宙万物终极的“道”和“太清”。他强调心在“致知”中的作用，但不认为以此可以代替“格物”等方法。“良知”为“心之动”而非“未动”之际的本体。这一点，似和晚明以来批评阳明学诸家的看法相近。

王阳明“致良知之学，发于晚年。”（见《明儒学案》卷十一“钱德洪”条下。中华书局标点本226页）日本学者楠木正继认为，王阳明是在平宸濠之乱后，确立“良知说”的。（楠木正继《王阳明晚年的思想——致良知论释》，《楠木正继先生中国哲学研究》537页。文言社，1975年）

由此可知，王道的思想在后期和阳明不同。综上所述，他的思想有一个受阳明学思潮的影响，赞同阳明学，对朱子学进行批判，进而到对阳明学晚期的

“致良知”说有所批判和保留的过程。

从曾主持过当时国家最高学府——南、北国子监的这位学者的思想变迁，是否可感觉到当时学界主流思潮变化的一些倾向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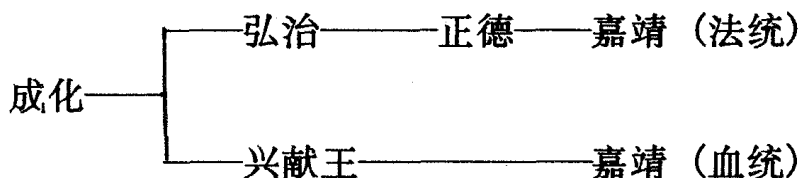
2，嘉靖前期的党争和王道的处世态度。

明中叶的正德、嘉靖间，最大的政争，是所谓“大礼议”。

起因是这样的：作为正德皇帝后继者的嘉靖皇帝，和那位我行我素的正德皇帝实际是堂兄弟。正德皇帝没有儿子。慈寿皇太后和大臣杨廷和等定策，以当时“兴献王”之子为继承人。是为嘉靖。（见《明史·世宗本纪》）

而正德皇帝是作为弘治帝之后人继皇位的。

其继承关系如下：



在严格讲究宗法制度的皇族中，每年例行的皇室祭祀和一系列礼仪时，嘉靖当作为何人之后，实际情况和“法统”名义便发生了矛盾。

嘉靖想尊崇自己亲生父母。故要以“兴献王”一系为正统。

以维护“祖宗仪礼”为己任的大臣们则强调，根据传统礼法，当以弘治以来的这一传授系统为正宗。

于是在一系列问题上（关于具体问题，要专门论述，此不展开），发生了争论。与经学性的“大礼之争”相关的政争是：以当时在正德皇帝时掌权的大学士杨廷和为代表的朝臣为一方，和以上书赞同嘉靖帝想法的桂萼、张孚敬、方献夫、霍韬、席书、郭勋等为另一方，发生了冲突。后者可称为“大礼议派”。

这实际是维系皇权专制统治的传统理法和现实的皇室人物情感的冲突，是皇权权力交替时的权力之争。

当时，嘉靖帝的反对派，在朝廷中占有相当的势力，据《明史何孟春传》《明通鉴》等的记载，嘉靖三年公开上书的就有190人左右。当时，王道正

在吏部任职。吏部上书反对的有十二人。是：郎中余宽、党承志、刘天民、员外郎马理、徐一鸣、刘勋，主事应大猷、李舜臣、马冕、彭泽、张昆鸟，司务洪伊。王道不预。（见《明史何孟春传》，《明通鉴》卷51，1915页。所记总人数稍有不同。）他同事的马理等，后受到较严厉的贬斥。

但另一方，新兴起的政治势力，赞成嘉靖帝之说，以求获得进取。“大礼”的支持派霍韬、张孚敬、方献夫、桂萼、席书、郭勋等。在嘉靖初，都受到提拔。方献夫是明确上书支持嘉靖帝之说的。后渐渐高升。而和王道同年的桂萼，直作到宰辅的地位。（见《明史》各人传记）但王道则未见升迁。

根据这样的情况来看，他殆持一种较游离的态度。

大礼议派在渐渐占据了中央政权的主要职务以后，党争并没结束。在其内部，又有所分化。如对王阳明的态度，席书和桂萼就相反。（见《明史桂萼传》。又见《明通鉴》卷54，2034页等。）

在嘉靖八年前后，以重新被起用的杨一清为代表的一方（包括谢迁、罗钦顺、吴一鹏、王准等人）和以张孚敬、桂萼、霍韬等大礼议派不和。互相攻讦（《明通鉴》卷54，2043页），结果是杨一清被排斥出京。

后，夏言以议论“郊祀”获得嘉靖帝青睐，而张孚敬、桂萼、霍韬等由于持论不同，受贬。（见《明史霍韬传》，《明通鉴》卷55，2058页）

夏言与霍韬、张孚敬、桂萼等不和。方献夫在“大礼议派”诸人中，是较平和之人，但从相互关系上讲，自然和张孚敬、桂萼等较近。殆因此原因，他在夏言地位日见上升的嘉靖九年五月引疾求退。（《明通鉴》卷55，2059页）

嘉靖十一年七月，经再三催促，隐居广州西樵山的方献夫虽再回京任职，但接着，张孚敬八月被罢，“大礼议派”诸臣已衰退，夏言“益用事”。（见《明通鉴》卷55，2080，2083，2085页）

这种情况，处于政府关键部门——吏部的王道，当然不会不感觉到。

嘉靖十一年九月，王道由方献夫推荐，任“春坊左谕德”，这和他早年也学阳明，跟方献夫有某种一致，也许有关。

然而，王道上疏力辞。后在家一年，被起为南京国子监祭酒。未几，于嘉

靖十三年四月又上疏辞职，连连上疏，在九月得以如愿。

他辞去“南京国子监祭酒”的最初上《疏》，正巧是在嘉靖十三年方献夫“致仕”的次月，而且《疏》中提及：“嘉靖十一年九月内，误蒙辅臣方奏荐”（见《王顺渠文录》卷一）恐怕不能视为仅仅是偶然吧。

他是看到当时政界的波澜，认识到自己的背景情况，不愿卷入纠纷之故也。

和他同年的林文俊在送他的《序》中说：“若以卧白云，茹紫芝为乐，而忘当世之治忽，非予所望于顺渠也。”（《四库珍本丛书》四集《方斋存稿》卷三《赠大司成顺涯王先生序》，文中也作“顺涯”。庆按，顺涯当是顺渠之误。引文中已校改。）也正是看到他恬淡仕途，想逃离宦海的这一面。

此后，他远离了中央政府，家居十三年。其间，政界又有很大变化。先是夏言与郭勋交恶。夏言执掌权柄后，他和严嵩又势同水火。严嵩系桂萼所提拔。为其子之师。（见《明史》和《献征录》卷16所收《严嵩传》）由于这种关系，其不和的背景，当又可以上溯到夏言和“大礼议”诸臣的争斗。

嘉靖二十五年前后，严嵩虽已占有相当位置，但还未如后来那样有权势。当时，严嵩用事，夏言被贬而复起用，二人之间，互相角斗。

王道再次被起用后，在夏言和严嵩二种势力之间，似也采取持中的态度。这从如下的事实，可见一斑：

史载，嘉靖二十六年，“罢礼部侍郎许成名、崔桐、少詹事王用宾、黄佐。先是，吏部左（疑右之误）侍郎缺，例用翰林资深者推补。尚书闻渊，初拟成名，桐忿争，乃并舍之而用祭酒王道。未几，道卒，渊乃拟桐及佐名上。”结果，由于给事中吕时中、徐霖、御史艾朴的反对，许成名、崔桐、王用宾、黄佐都被置之不用。（《明通鉴》卷五十九，2239页）

此事证以《明史·黄佐传》，乃是由于夏言在后主持之故。

吏部尚书闻渊，是在吏部尚书周用死后，于嘉靖二十六年初，刚由刑部转任者。（《明史·七卿年表》，《闻渊传》）吏部则是严嵩出身，由此飞黄腾达的根据地。（见《明史·严嵩传》）

夏言反对用许成名、崔桐等。很带有和严嵩争势的色彩。但他不反对用王

道。

王道和严嵩的交往，在嘉靖初就有了。（见前第一部分所述）后来在嘉靖二十五年被举为南京太常卿，未数月，到北京掌国子，而此时，正是严嵩执掌朝柄之际。次年，升为吏部右侍郎。

王道死后，其子又请严嵩为撰《神道碑》，则他和严嵩的关系也可见而知。他在当时党争中，持“执中”的态度，当可明白。而这和他在《老子亿》中所主张“无为”，的处世态度，可互相印证。

从王道的身上，可以看出当时政坛争纷的一些情况。而象他那样的文人，为数尚不少，如当时的文征明、王磐、冯惟敏等，都有这种倾向。这也许是社会激烈动荡时期，没有实际政治力量，而又不想奉迎权势者的文人，苟且求存的一种处世方法吧。

3，嘉靖时期社会思潮的流变。

明代自明初到正德、嘉靖，历经百五十年，世界发生了相当的变化。社会中蕴存着相当的变动能量。这在思想领域中也明显地反映出来。

首先是朱子学权威的动摇。

明初永乐时，官订《四书大全》，主要采用的就是朱子学中最严厉地主张“理气相分”情欲相离的黄榦一派的主张。（参见拙著《中国文化中人的观念》第五章，667-669页）

在明正统年间，情况已出现了一些变化。到正德、嘉靖间，情况就有了更大的改变。作为官方正统意识形态的朱子学的权威明显动摇。“大礼议”桂萼等人持论，批判所谓“宋儒”，所指就是当时视为正统的朱子学，这一点，反对他们的杨慎等人嘉靖三年的联名上疏，可以证明。《疏》中明确指出“臣等所持者，程颐、朱熹之说也：萼等所执者，冷褒、段犹之余也。”（见《明通鉴》卷51，1909页）不管他们所说的“程颐、朱熹之说”是否是真正的程颐、朱熹之说，但在这样的争论中，朱子学的地位被动摇，则可谓是不争的事实。

前面谈到的《老子亿》对朱子说的那样公然的批评，出于处世立身都以持静“无为”为宗旨的王道之口，就更可反映出这一点。

其次是阳明学的在当时社会上的流传和挫折。以及阳明学在一般知识人中的受容情况。

正德、嘉靖间，阳明学一度是不少人信服的学问。“时王守仁以心学立教，海内宗之。”（《明通鉴》卷53，1992页）方献夫、徐阶等都为其门下。王道、朱节（字守中，一作守忠）、黄绾等也都受其影响。（见《明儒学案》卷42，卷11，卷13等）

但在嘉靖中期，阳明学有所挫折。

从阳明学在政府中的支持者来看，席书在嘉靖六年，王琼在嘉靖十一年，先后死去。嘉靖十年后，方献夫、霍韬、张孚敬等某种程度上的支持者先后离开中央权力中心。（见《明史》各传。《明通鉴》卷56，2133页以下。）

从当时政府当权者的态度来看：

桂萼对王守仁，视为异己。（《献征录》《桂萼传》）杨一清对王守仁也“不能无憾”。（《明通鉴》卷56，2133页以下）

所以，嘉靖八年前后，政府对阳明学的态度就渐趋严厉。

嘉靖十六年，“罢各处私创书院。时御史游居敬论劾王守仁、湛若水伪学私创，故有是命。”（《明通鉴》2140页）这就更明显了。

王道批评“阳明”的“致良知”说，殆就是在这一时期。

也就是说，阳明学的兴起，有一个起伏的过程。嘉靖中期，处于正在兴起但还未展开的地步。这种情况，我们在研究明代思想文化时，应该注意。

反之，王道这样一位全国最高学府的负责人，从对王守仁学说，尤其是“致良知”说的反驳，由信而质疑，不也正反映出“阳明学”展开过程中的挫折和阳明学的一些过于急切的观念不被当时的知识界所接受的情况吗？

再次，是学者和道教神仙说之间的关系。

嘉靖时期，道教泛滥。嘉靖皇帝，是道教的狂热信奉者。

“大礼仪”之争，使他对一些儒生大为恼火。而对于方士，多加信用。如嘉靖19年，嘉靖帝的父亲“永陵”建成后，信道士段朝用，炮制“不死之药”，太仆寺卿杨最，则因“谏炼丹，予杖死。”（《明史·世宗本纪》）他为炼丹养性，几乎被宫女弄死。（见《明史·后妃传世宗方皇后》）

因此，终嘉靖之世，道教猖行。这是明代道教最发皇的时期。

尽管如此，一般知识阶层是如何对待道教呢？

薛蕙在所著《老子解自序》中曰：“予早岁嗜神仙长生之术，凡神仙家之说，无不观也。晚读《老子》而好之。当是时，余方蕲向圣人之道，致思性命之理。盖久之，而若有所得，考诸《老子》无异也。迺知昔之所嗜者，第方士之小术，而非性命之学也。复知《老子》之道，惟导人反其天性，而非异端之流也。性命者，道也，天下之一本也。”这很能反映他的态度，反映出一部分知识人对当时潮流的反拨（即想对道教化解释《老子》的倾向加以反思，用他们视为正道的“性命之理”，对道教奉为教典的《老子》加以解释）的动向。

严嵩之所以不齿于文人，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走“道士”路线，以“献青词”而邀宠。（沈德符《万历野获篇》卷27“月中仙人”条，又见《献征录》所收《严嵩传》）

王道读《老子》当然有其本人的思想发展和认识的因素，但和这样的社会现实，也绝不能说没有关系。他想在儒、道两者之间，探索其共同点。但和神仙家的金丹方术等，则完全是两回事。在前面已经谈到过了。

有些学者把中国的道教和道家完全混为一谈，甚至把儒家学说也和西方概念中的宗教（religion）完全等同起来的做法，是应该再加思考的。

总之，王道的《老子亿》，不仅对于认识明代中期的《老子》的研究状况，而且对于认识明代思想潮流变迁的状况，都有相当的参考价值。

征引文献：

《明史》（中华书局，北京，标点本）

《明通鉴》（中华书局，北京，标点本）

《国榷》（中华书局，北京，标点本）

焦竑《国朝献征录》（上海书店影印本）

黄宗羲《明儒学案》（中华书局，北京，标点本）

黄虞稷《千顷堂书目》（上海古籍出版社，瞿凤起、潘景郑等整理标点本，1990年）

- 叶昌炽《藏书记事诗》（上海古籍出版社，王欣夫补正本。1989年版）
- 王重民《老子考》（《中华图书馆协会丛刊》第一种，1928年）
- 《全国善本书目》（上海古籍出版社本）
- 郑晓《吾学编》（中华书局，北京，标点本）
- 何良俊《四有斋丛说》（《笔记小说大观》15辑影印本）
- 沈德符《万历野获篇》（中华书局，北京，标点本）
- 朱熹《朱子语类》（台北，正中书局影印本）
- 王道《老子亿》（1932年日本影印尊经阁所藏本）
- 林兆恩《道德经释略》（台北，严灵峰《无求备斋老子集成》）
- 王守仁《王阳明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沈起凤、吴光等标点整理本）
- 严嵩《钤山堂集》（影印《四库全书》本）
- 王道《王顺渠文录》（1932年）
- 林文俊《方斋存稿》（《四库珍本丛书》四集本）
- 拙著《中国文化中人的观念》（学林出版社，上海，1997年版）